

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歷程

張忠培

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

【內容提要】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新石器時代發現與研究成果，是廿世紀後半期求索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最初起點。後半期歷程曲折，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後期又可分為前、後兩段。考古學在這期間所處的整體環境，不斷湧現的新發現，以及一些賢人的不畏艱難的追求，使層位學取得了新的進步，類型學重新獲得了譜系定位，提出了考古學文化命名說，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和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漢帝國道路的學說，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新石器的知識結構，形成了新的認識系統，基本完成了相關時期重建史前史的歷史任務。然而，探索和研究歷史，既無窮境，又無窮期，新石器時代的新奧秘，又顯現在研究者的面前，堅持實事求是，艱苦奮進，雖不能達到歷史的真實，卻可接近真實的歷史。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年代，起自中石器時代結束，止於夏王國創立時期，經歷了一萬餘年。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是這後半期求索的最初起點。而最近五十年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極大地改變了二十世紀前半期形成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知識結構，產生了較為完整的系統認識，擺脫了原先依靠歷史傳說認

識這萬餘年歷史的局面，基本完成了相關時期的重建史前史的歷史任務。

縱觀最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回顧學術界對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歷史所走過的量變到巨質變的認識過程，我們當以蘇秉琦於一九七五年發表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的演講，作為區分這一認識過程出現巨質轉變的重要標誌。以一九七五年為界，恰可將這二十世紀後半期，分為前二五年和後二十五年。

二

後二十五年，又可以一九五七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段。

(一)

前段，考古學界接受了前蘇聯考古學的影響，強化了考古學是廣義史學的組成部分這一中國考古學的優良傳統認識的同時，也錯誤地把某些人的史學觀點，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身，而視為不可動搖的經典，使實事求是的樸學傳統受到了衝擊。總的來說，這幾年政治環境較好，給獨立、自由的思考和實事求是的學風保留了相當大的空間，是人們追求馬克思主義和努力工作的年頭。黃河中游是這期間考古工作的重點地區，同時在其它地區也作了一些工作。京山屈家嶺【註一】、南京北陰陽營【註二】、臨洮馬家窯—瓦家坪【註三】、蘭州白道溝坪【註四】、西安開瑞莊【註五】及半坡【註六】和陝縣廟

【註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嶺》，科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五年。

【註二】：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陰陽營第一、二次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一期，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三】：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肅臨洮、臨夏兩縣考古調查簡報》，《考古通訊》一九五八年，九期三八—四一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註四】：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蘭州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一期，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五】：A 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調查發掘團通訊組：《一九五二年陝西考古調查工作簡報》，《科學通報》一九五一年，九期。B 蘇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佈》，《考古通訊》一九五六年，二期三二—三八頁，科學出版社，北京。C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禮西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北京。

【註六】：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北京。

底溝及三里橋【註七】的發掘及研究比較重要。現簡略地作如下說明：

1. 是開瑞莊與三里橋的工作。開瑞莊亦名客省莊。一九五一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調查發掘團於開瑞莊發現了西周墓葬穿破現名之爲客省莊文化灰坑，後者又打破今名爲西陰文化灰坑這樣一組層位關係。蘇秉琦於一九五一年發表的《簡報》中指出：後兩種遺存「和河南境內的兩類不同的史前文化遺存好像是遙遙對照的」【註八】，含蓄地講出了它們的區別及年代上大致對應的關係，對當時頗爲流行的仰韶文化起源於西方和龍山文化源於東方，以及兩者於陝晉豫鄰近地區匯合形成「混合文化區」的觀念，提出了質疑。一九五五年，對客省莊的大規模發掘，不僅再次揭示出上述層位關係，還獲得了大量資料，得以把蘇秉琦稱之爲「文化二」改爲「客省莊第二期文化」，今名之爲「客省莊文化」。這是繼後岡、龍山等地之後，確認的龍山時代的另一種文化。

一九五七年配合黃河水庫工程對三里橋遺址進行大面積的發掘工作，再次揭示出「龍山文化」在上、「仰韶文化」在下的層位關係，和這兩類遺存的大量資料。這裡的龍山時代的遺存，雖早見於仰韶村及不召寨等地，但這次發掘則是首次搞清楚它的層位關係、文化面貌及特徵，當是繼「客省莊二期文化」之後，被確認出來的龍山時代的另一種遺存。至於這裡的仰韶文化遺存，《報告》認爲它「和半坡可能是比較接近的，或可以暫歸於同一種類型」【註九】，後來的研究，則指出它是半坡類型轉化爲廟底溝類型的過渡性遺存【註一〇】。

2. 是半坡及廟底溝遺址的發掘。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中，以揭示聚落爲目標而採用探方方法發掘，始於一九四一—一九五七年的半坡的工作。這次發掘雖只對半坡遺址作了部分揭露，但從這被揭示出來的部分，可窺視出村落的佈局、結構。半坡的發掘，揭開了研究新石器時代聚落的序幕。同時，半坡和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廟底溝的發掘，提供了一

【註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一九六三年，北京。

【註八】：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調查發掘團通訊組：《一九五一年陝西考古調查工作簡報》，《科學通報》一九五一年，九期，九四二頁。

【註九】：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一一四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註一〇】：張忠培、嚴文明：《三里橋遺存的文化性質與年代》，《考古》一九六四年，六期三〇一—三〇五頁，考古雜誌社，北京。

批使學術界在當時內涵混染的仰韶文化中分開出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即今分別名爲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較爲完整的資料，從而引發了仰韶文化劃分類型以及類型關係，尤其是半坡與廟底溝類型孰早孰晚的討論。另外，廟底溝發掘所揭示出來的被稱爲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雖前見於仰韶村及荊村等遺址，但這次工作卻搞清了它的層位、面貌、特徵，並指出它「是從仰韶到龍山的一種過渡性質的遺存」，「而『河南龍山文化』和『陝西龍山文化』又是繼承廟底溝第二期文化而繼續發展的」【註一一】。

3. 是臨洮馬家窯—瓦家坪遺址與蘭州白道溝坪的發現。後者揭露的馬廠文化窯場，爲新石器考古中前所未見。這次發掘搞清楚，窯場的布局與結構；前者發現的西陰文化在下，和馬家窯文化在上的層位關係，給學術界提供了認識甘青地區含彩陶的文化遺存，晚於西陰文化的最初出發點，爲否定「仰韶文化」源於西方說提供了重要證據。

4. 京山屈家嶺和南京北陰陽營遺址的揭露，分別辨認出屈家嶺文化與北陰陽營文化。前者使學術界開始認識到江漢地區也存在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同時揭開了研究長江中游及漢水流域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序幕；後者，是繼良渚之後，於長江下游揭示出的另一種而年代早於良渚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進一步引發人們研究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的興趣。

可見，二十世紀下半期最初八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雖是沿著以往新石器時代考古向前展現的軌跡走向前去，卻增大了工作規模，擴大了視野，修正了以往的錯誤認識，提出了新的觀點。新石器時代的研究，獲得了縱深發展。

(二)

後段，時值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五年。這一時期，除經濟困難三年政治環境稍微寬鬆一些外，階級鬥爭爲綱的極左路線，愈益膨脹，籠罩大地，直至發展爲文化大革命，把整個社會推入十年浩劫之中。大躍進期間，考古學的實事求是的學術傳統，遭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文化定名、層位學、類型學乃至一般田野考古技術，不是被當成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就被定成繁瑣哲學遭到批判。而十年浩劫的來臨，考古學被迫停止了一切工作。然而，世界總是多姿多彩，同一事務至少也有兩面，濫用資源，違背科學的烏托邦大躍進，卻鼓動起那些單純又想做事情的人的工作熱情與勁頭；激烈批判的喧囂中，往往卻

【註一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一二一—一二九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北京。

引發人們對同一事物的另面思考；停止人們的考古工作，卻阻止不了人們思考以往積累的考古資料，產生新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任何外在的強力，改變不了學科的內在規律。當然，學科的內在規律是靠人來實現的。可喜的是，面對大躍進刮起的極左思潮，尹達、夏鼐、蘇秉琦這些有識的考古學家，站了出來，頂住了考古學界極左思潮的泛濫，而在十年浩劫中，又有蘇秉琦的雖是悄悄的卻是深刻而別開生面的思考。在他們的支持、指導及影響下，一些考古學者艱難奮進，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學風，作出了成績。是這些考古學者的努力，才減少了一些災難，和前段時期考古工作相比，才使這段時期考古學有了新的進步。

其一，是考古學文化定名說的提出，和層位學的進步及類型學的譜系定位。

針對大躍進時期提出的應以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及文明時代的一般概念，替代對遺存應作考古學文化的劃分，否定考古學文化這一概念的思潮，夏鼐發表了〈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註一二〕的講話。他在這篇考古學文化定名說中，科學地回答了什麼是考古學文化，劃分考古學文化的標準，考古學文化定名條件、時機及如何定名等這些考古學的基本問題。探討這些問題時，夏鼐依據的基本上雖是柴爾德的學說，卻又是超出柴爾德時空而適合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創造，同時，他沒有停在柴爾德原則上止步不前。夏鼐在這篇講話中，進而提出「那些算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那些只是地區或時代關係而形成的一個文化的兩個分支」這樣重要而頗具啓迪性的見解。他對此雖持「留待將來有機會時再加詳細討論」的謹慎態度，卻將考古學文化應區分類型與期別，以及對文化與類型或期別應如何界定這樣一些考古學基本問題的思考，首次相當明確地提了出來。這一篇逆潮流的、撥亂反正的講話，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篇理論著作，把中國考古學的理论思維提高了一個新的層次。它捍衛了考古學遺存分類的科學原則，推動了考古學文化及其類型，尤其是當年仰韶文化區分類型的研究，促進了考古學的健康發展。

無獨有偶，在「大躍進」中，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組成的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陝西分隊華縣隊也從極左思潮的風口浪尖中衝了出來。華縣隊配合黃河水庫建設進行的考古工作，在蘇秉琦的指導下，該隊制訂的工作計劃，是通過學生的教學實習，

【註一二】：夏鼐：〈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考古》一九五九年，四期一六九—一七二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護探討泉村遺址的仰韶遺存的分期。然而，於一九五八年秋季發掘工作開始不久，工地就掀起了「拔白旗，插紅旗」、「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把田野考古操作的科學程序及要求當成資產階級的繁瑣哲學予以批判，以實現考古學「大躍進」。在這股極左思潮的衝擊下，實事求是的科學原則和「大躍進」掀起的熱浪，尖銳對立，工作難以進行下去，蘇秉琦、尹達和宿白於關鍵時刻先後來到工地指導工作支持堅持實事求是按科學原則工作，而處境困難的一方，遏制了極左思潮的干擾，改善了學術環境，不僅使該隊完成了泉護遺址的發掘任務，而且擴大了工作規模，發掘了元君廟墓地，和在渭河下游的華縣及渭南探索先秦遺存的類型、文化序列與譜系，以及遺址的分佈，開展了普查及試掘。這樣，把調查、試掘和大規模發掘結合起來進行考古工作的同時，也在實踐中推進了層位學及類型學。

在層位學方面，華縣隊於考古發掘實踐中，摒棄了考古界當時流行的把一地層及其下的單位，或這一地層及其開口單位歸為同一層位或同一時期的簡單作法，力求找出當時的地面，只把共處同一地面的諸單位視為和地面共時的遺存，而把地面同其下的堆積，和後者或地層（這一術語源於地質學。但現在中國考古學使用這一術語所表述的現象，及這些現象形成的條件，原因，卻相當複雜，已非地質學中的「地層」這詞所能涵蓋，暫不在此討論。）與其下的灰坑、房屋、墓葬等單位，均視為獨立層位進行研究，又將諸如窖穴、半地下房屋這樣的單位，依其建造前、建造時、使用時、廢棄時，乃至廢棄後的堆積劃分為不同的層位，在發掘時，依客觀實際情況區別開來，以求將其年代定得更為精確，並在這精確年代的前題下，探討這些單位的年代差別，和諸遺存單位的共時性。

在類型學方面，蘇秉琦於《瓦鬲的研究》中將同類器物分成不同的型，和把同型的器物分為不同式別的类型學思想，在一九五八年前不僅基本上被考古學界所接受，反而在一九五八年極左思潮衝擊下，被當成資產階級繁瑣哲學乃至偽科學而遭到惡厲的批判。然而，華縣隊在蘇秉琦身體力行的具體指導下，又經過和他反復交鋒，終於在排比陶器的實踐中，接受了他的類型學思想，並將其中的譜系觀念突顯出來。同一考古學文化的陶器縱橫關係，反映陶器的譜系。故理清一考古學文化陶器的譜系，既是排比陶器的出發點，又是標舉陶器排比是否正確的標尺，同時，應以適當的概念或述語，例如類、型、式來正確表述陶器縱橫關係。這就是突顯蘇秉琦類型學中的譜系觀念的基本內涵。排比陶器是這樣，研究其它考古學遺存也當如

此。這樣，就把考古類型學定位於考古學遺存的譜系研究。

其二，是渭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序列與譜系的確定，和元君廟半坡文化墓地的社會組織及社會制度的研究。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陝西分隊華縣隊，通過陶器分期、墓葬編年、屍骨性別年齡鑑定、葬式差異和死者與隨葬器物或墓葬用料的關係等，解析元君廟半坡文化墓地〔註一三〕，獲得了社會組織及社會制度的認識。這是繼半坡村落之後的另一形態的聚落研究的先例，提供了解析墓地的方法，開創了研究墓地的道路。同時，該隊確認了早於並是半坡文化前身的老官台文化〔註一四〕，及位於半坡四期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之間，並是由前者轉化爲後者的泉護二期文化〔註一五〕，以及通過元君廟半坡文化墓地及泉護村遺址西陰文化的分期〔註一六〕，得出的西陰文化只能是半坡四期文化的前身，和半坡文化通過郭老村〔註一七〕、下孟村〔註一八〕及三里橋〔註一九〕這類中介遺存發展爲西陰文化的新認識。這樣，就不僅充實了渭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而且認識到老官台↓半坡↓西陰↓半坡四期↓泉護二期↓廟底溝二期是同一譜系不同發展階段的諸文化。至於三里橋文化只是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後裔，或者廟底溝文化是客省莊文化和三里橋文化共同的前輩的問題，當時的研究還不能確指。在仰韶時代之前，黃河流域是否存在直接早於它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自我世紀二十年代發現「仰韶文化」以來一直存在的十分重要的問題。早於仰韶時代半坡文化的老官台文化的發現，爲徹底破除「仰韶文化」西來說，提供了堅實的證據，同時也啓發人們去找尋和老官台文化同時的其它文化遺存。而在中國率先建立的渭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爲我國其它地區，尤其是和渭河流域諸文化存在著直接文化聯系的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編年樹立了一個標尺，同時，也啓發人們去探尋這些地區已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中的文化缺環。

【註一三】：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

【註一四】：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華縣報告編寫組：《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三期二九七—三〇四頁，北京。

【註一五】：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華縣泉護村》，未刊稿。

【註一六】：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華縣報告編寫組：《華縣、湯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一九八六年，三期三〇七頁，北京。

【註一七】：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五〇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

【註一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八六—九二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北京。

其三，除渭河流域外，其它地區也發現了很多重要遺存。例如：甘肅武威皇娘娘台【註二〇】、山西太原義井【註二一】、河南洛陽王灣【註二二】及鄭州大河樹【註二三】、山東寧陽大汶口【註二四】及曲阜西夏侯、河北滋縣界段營【註二五】、下潘汪【註二六】及唐山大城山【註二七】、北京昌平雪山【註二八】、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註二九】及敖漢旗小河沿【註三〇】、遼寧瀋陽新樂【註三一】、吉林市二道嶺子【註三二】、黑龍江密山新開流【註三三】、上海青浦

【註一九】：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六〇年，二期五三一—七頁，北京。

【註二〇】：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義井村遺址清理簡報〉，《考古》一九六一年，四期二〇三頁—二〇六頁，北京。

【註二一】：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洛陽王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六一年，四期一七五—一七八頁，北京。

【註二二】：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遺址〉，《考古》一九三三年，六期三三〇—三三六頁，北京。

【註二三】：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三期三〇一—三七四頁，北京。

【註二四】：A 楊子范：〈山東寧陽縣頭遺址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五九年，一〇期六一—六四頁，北京；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大汶口》，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北京。B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山東曲阜西夏侯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六四年，二期五七一—一〇五頁，北京。

【註二五】：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磁縣界段營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七四年，六期三五六—三六三頁，北京。

【註二六】：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磁縣下潘汪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五年，一期七三一—一六頁，北京。

【註二七】：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三期一七—三四頁，北京。

【註二八】：魯琪葛英會：〈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覽巡禮〉，《文物》一九七八年四期二四頁，北京。

【註二九】：中國科學院古研究所內蒙工作隊：〈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六四年，一期一—五頁，北京。

【註三〇】：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一九七七年，二期五一—九頁，北京。

【註三一】：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新樂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四期四四九—四六六頁，北京；又〈瀋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二期二〇九—二二二頁，北京。

【註三二】：張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遺址的文化類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九四年，一期，長春。

【註三三】：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四期四九—五一八頁，北京。

【註三四】：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的試掘〉，《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二期一—三〇頁，北京；黃宣佩等：〈青浦縣崧澤遺址第二次發掘〉，《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一期二九—五八頁，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崧澤》，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崧峰【註三四】、江蘇邳縣劉林【註三五】及大墩子【註三六】、浙江嘉興馬家濱【註三七】與餘姚河姆渡【註三八】、江西萬年仙人洞【註三九】與修水山背【四〇】，以及福建閩侯縣石山【註四一】等等。限於篇幅，不能對所有重要發現在此一一提及，也不能將已提到的這些重要發現一一述評，現將其重要意義簡述如下：

1. 河北磁縣界段營及下潘汪發現的稱為後岡類型的遺存，文化面貌與以前認識的後岡一期文化接近而又有些區別，年代則較早。萬年仙人洞遺存的文化面貌，相當原始，年代應早於老官台文化。這一發現顯示鄱陽湖地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源地之一。

2. 唐山大城山的龍山時代遺存，和武威皇娘娘台齊家文化遺存，均發現了銅製品。這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於當時見到的年代最早的銅製品，啓迪人們思考龍山時代已進入金屬時代的問題。而於劉林、大汶口及皇娘娘台發現的區別於元君廟及半坡合葬制的男女合葬墓，提供了學術界考慮這種區別的社會背景：劉林已進入父系制門檻問題；皇娘娘台的一男二女、男尊女卑的合葬墓，則在當時被認為是父權制時代的葬俗。

3. 在以往發現的基礎上，至洛陽王灣的發掘，基本上確立了伊洛—鄭州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與編年。大河村的發掘，不

- 【註三五】：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邳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八一—一〇二頁，北京；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次發掘〉，《考古學報》一九六五年，二期九—四七頁。
- 【註三六】：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六四年，二期九—四七頁，北京。
- 【註三七】：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嘉興馬家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一九六一年，七期三四五—三五二頁，北京。
- 【註三八】：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一九七八年，一期三九—四四頁，北京；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一九八〇年五月一—二頁，北京。
- 【註三九】：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試掘〉，《考古學報》一九六三年，一期一—九頁，北京。
- 【註四〇】：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修水山背地區考古調查與試掘〉，《考古》一九六二年，七期三五八—三六七頁，北京。
- 【註四一】：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閩侯縣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四次發掘報告〉，《考古》一九六一年，二期六六—九一頁，北京；〈福建閩侯縣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五次發掘報告〉，《考古》一九六四年，二期六〇—六二、六六—六八頁，北京；福建省博物館：〈閩侯縣石山遺址第六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六年，一期八三—一一九頁，北京。

僅爲這一考古學文化序列補充了新的資料，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秦王寨時期村落的布局與結構，以及房屋結構研究的興趣。大汶口的發掘，提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劉林、大墩子及西夏侯的發掘，補充了這一文化的內涵，結合以往對龍山文化的認識，可以認爲在泰沂地區已基本確立了與渭河流域平行的另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4. 除上述外，這時期發現的本文所列的其它遺存，均填補了所在地區文化序列的空白，除吉林市二道嶺子外，都是新見的考古學文化依以命名的遺存。同時，在確認二道嶺子這類遺存之前，松花江及其以東地區被認爲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年代均晚於新石器時代，故二道嶺子這類遺存的確認，是識別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先例。總之，由於這批新的遺存的發現，中國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各具特色，相互異趣，五彩繽紛，又具相似性的形像，更廣闊、深刻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如果沒有極左思潮的干擾，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考古學當然不只是取得這樣一些成果，那麼，會獲得什麼樣的以及那些更大的成果？這是一個應引起思考卻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迴避這一問題而回到史實中來的話，那麼，以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發現及研究成果，同此前的這一學科的狀況作一比較的話，無疑，人們可以見到的是：學術界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認識出現了基本變化，知識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觀，同時，新的理論似將破殼而出。

三

「文革」這一史無前例的浩劫，窒息考古學，給廣大考古學者，尤其是這個學科的代表性人物製造了災難。歷史卻依辯證邏輯向前滾動，人們從被愚昧、被迫害中覺醒起來，開始了新的思考。蘇秉琦是這些覺醒起來的考古學者中的一位先進代表。

「文革」一開始，蘇秉琦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挨了鬥，被抄了家，所有考古學筆記也被抄得殆盡，取銷了他的工資，只發給微薄的生活費，直到落實了政策，被抄走的筆記，也沒有退回給他。七十年代初，被攆到「五七」學校勞動改造。然而，在此逆境中，他仍念念不忘考古，勞動改造期間，作起「業餘考古」【註四二】來，筆記被抄了，他便用剩下

的頭腦思考文革前走南闖北於考古工地觀察、摩挲過的資料，探討考古學問題，結果是跳出「兩個怪圈」【註四三】，悟出隱藏在資料後面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

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不是自天而降的理論。前面已指出「中國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各具特色，相互異趣，五彩繽紛，又具相似性的形象，更廣闊、深刻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便是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的學術背景。它是從這沃土中破土而出的新理論，也是以往將遺存區分為考古學文化與類、型進行了具體研究的理論概括。

在「文革」將要結束，政治環境仍處於黎明前的黑夜，鄧小平復出卻給人們帶來一線希望的一九七五年夏季，蘇秉琦將他的這一理論向吉林大學考古專業部分師生作了一次報告。這預示著考古學新時期的來臨，是中國考古學最近二十五年起步的標誌。在這人們不能自主、自由思考的年代，這類異見不能公開發表，卻悄悄地傳播開來，「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踴躍而趨之」。毛澤東逝世了，「四人幫」被打倒，「兩個凡是」被推翻，伴隨著「文革」的反思，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國人民經歷著再一次思想解放。在這適宜學術的環境中，蘇秉琦將上述報告整理成文發表出來【註四四】，接著，又於一九八五年發表了〈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註四五】。蘇秉琦在這兩篇著作中，或以自己的話語，或以注入了自己概念的傳統語彙，表述了自己的理論，是自夏鼐「文化定名說」之後的中國考古學人的理論思維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誌，既對考古學成果作了科學的總結，又對廣大考古學者因真理標準的討論而啓迪的活躍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提供了新思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把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水平及學科的理論建設，推到了一個階段。

【註四二】：蘇秉琦：〈七十年代初信陽地區考古勘察回憶錄〉，《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四期，鄭州。

【註四三】：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二一五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香港。

【註四四】：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二二五—二三四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北京。

【註四五】：蘇秉琦：〈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七六一—七九頁，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瀋陽。

自一九七五年，尤其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考古學的新發現，遍地開花，層出不窮，其中最重要的當數湖南道縣蛤蟆洞【註四六】、河北武安磁山【註四七】、河南新鄭裴李崗【註四八】、山東臨淄后李【註四九】、遼寧敖漢興隆窪【註五〇】、湖南澧縣彭頭山【註五一】及八十嘴【註五二】，遼寧敖漢趙寶溝【註五三】、河南鄭州八里崗【註五四】、鄭州西山古城【註五五】、湖南澧縣城頭山【註五六】、安徽含山凌家灘【註五七】、浙江餘杭良渚反山【註五八】及瑤山墓地【註五九】、甘肅秦安大地灣半坡四期文化遺址【註六〇】、遼寧凌源牛河樑【註六一】、西藏昌都卡若【註六二】、內

【註四六】：袁家榮：〈玉蟾岩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一版，北京。

【註四七】：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一九七七年，六期三六一—三七二頁，北京；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一年，三期三〇三—三三八頁，北京。

【註四八】：開封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七七年，三期一九七—二〇五頁，北京。

【註四九】：濟青公路文物考古隊：〈山東臨淄后李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二年，一二期，四八三—四九二頁，北京。

【註五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五年，一〇期八六五—八七二頁，北京。

【註五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省澧縣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調查報告〉，《考古》一九八九年，一〇期八六五—八六八頁，北京。

【註五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夢溪八土壩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六年，一二期二六—三九頁，北京。

【註五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敖漢趙寶溝新石器時代聚落〉，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註五四】：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河南鄭州市八里崗遺址一九九二年的發掘與收穫〉，《考古》一九九七年，一二期一—七頁，北京。

【註五五】：張玉石等：〈新石器時代考古獲重大發現〉，《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一〇日，北京。

【註五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城址調查與試掘〉，《文物》一九九三年，一二期一九一—三〇頁，北京。

【註五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九年，四期一—九頁，北京；張敬國：〈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墓地第二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研究》輯二五九—二六七頁，黃山書社，一九九一年，合肥。

【註五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八年，一期一—三一頁，北京。

【註五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八年，一期三二—五二頁，北京。

【註六〇】：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秦安大地灣九〇一號房址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一—二二頁，北京。

【註六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樑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文物》一九八六年，八期一—一七頁，北京。

【註六二】：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北京。

蒙察右前旗廟子溝【註六三】、湖北天門石家河【註六四】、河南登封王城崗【註六五】與淮陽平糧台【註六六】、山東章丘城子崖【註六七】和臨朐朱封大墓【註六八】等等。實在太多，難以一一提及，同時對這裡列出的重要發現，也只能僅就它們的重要學術意義，簡略說明如下：

其一，蛤蟆洞，亦稱玉蟾岩，年代和前述萬年仙人洞相當。由於它的發現，可把植稻農業及陶器的起源，以及新石器時代的出現，可以明確地推到公元前萬年以上。

其二，彭頭山和趙寶溝，是依以命名彭頭山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遺址，八十墩屬彭頭山文化。這兩文化的年代基本與半坡文化相當，起始年代或許較早。它們之被發現，填補了所在地區文化序列的空白。興隆窪、八里崗和上面未提及的安徽蒙城尉遲寺【註六九】所揭示的聚落，文化及年代上填補了以往聚落發現的空白，又較以前見到的聚落保存的更為完整。磁山、裴李崗、后李及興隆窪，均是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遺址，年代均基本位於老官台文化階段。它們的發現，將其所屬譜系的考古學文化群體的年代上限，推至公元前六千年。同時，據它們還可以認為：一是它們所繫譜系的考古學文化群體的起始年代，當更早；二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起源當是多元的。

其三，從玉蟾岩這類面積僅百平方米的洞穴居址，到三萬平方米規模的八十墩聚落的擴大過程，當反映共居的居民組織由小而大的變化，是否也同時體現了居民組織結構與性質的演變？如果是，這一變化的具體過程又是怎樣的？

【註六三】：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考古紀略〉，《文物》一九八九年，一二期二九—三九，二八頁，北京。

【註六四】：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石家河遺址調查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二—三—二九四頁，一九九三年，成都。

【註六五】：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與陽城〉，二八—六二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

【註六六】：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陽平糧台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三年，三期二—三六頁，北京。

【註六七】：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遺址又有重大發現，龍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見天日〉，《中國文物報》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註六八】：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臨朐縣西朱封龍山文化重檸墓的清理〉《海岱考古》一輯二—一九—二二四頁，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濟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墓葬〉，《考古》一九九〇年，七期五八七—五九四頁，北京。

【註六九】：梁中合：〈尉遲寺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初見規模〉，《中國文物類》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北京。

其四，除上述外，前列居址、城址、宗教址和墓區及墓葬，均反映了中國新石器時代階段性的巨質變化，是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發現。

回顧這二十五年走過的歷程，還可以見到如下的重要事實：

1. 是多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及技術科學廣泛參與考古學遺存的測試與研究，光大了中國考古學這一傳統，並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使中國考古學和參與考古學遺存測試與研究的學科，形成了相互影響、滲透、促進的局面，擴大了考古學的影響。

2. 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和中國文明起源及形成問題，是這時期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的主題。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起源的多元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構成是譜系多元的板塊結構，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是不同譜系的文化因素的多元結構、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觀點，以及多元的文化及文明彼此相關而成一體的認識，已成爲學界的基本共識。

3. 學術思想活躍、多變，和境外考古學理論、方法、流派大量湧入且發生著正面或負面、或多或少的作用，以及境外學者參與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是前二十五年所未見到的現象。然而，蘇秉琦理論卻在這一環境中主導了中國新石器時代乃至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過程，而且吸引了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境外學者，甚至被他們吸納，也是前所未見的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特點。

4. 從中國新石器時代發現與研究成果，以及學科的理論建設觀之，可認爲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得了巨大進步，步入了黃金時代。

四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發現與研究，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尤其是在蘇秉琦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與「文明論」影響下的最近二十五年，取得了巨大進步，除本文列舉的那些重要發現及研究外，在自然環境、農業、工藝、宗教和社會制度與社會組織，以及居民種屬，健康的研究，均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實踐到理論形成了較

完整的體系，能較清楚說明這時期的歷史變化過程，基本完成了相關時期史前史的重建工作。

當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地區研究水平不平衡、同一地區的不同年代或文化遺存的研究不平衡、同文化或同期的遺存類型的研究不平衡，以及同類型遺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等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在〈中國考古學世紀的回顧與前瞻〉【註七〇】中作過一些討論，這裡就不重述了，同時，除此之外，需要我們予以解決以打開新局面的問題，還有很多，這裡也不一一提及了。現僅就如下幾個問題，作點述評。

其一，是中石器時代問題。西亞考古學編年將舊石器時代和前陶新石器時期之間，橫隔著後舊石器 and 原史新石器兩個時期，雖沒有使用中石器時代之詞，卻認為新石器時代不是從舊石器代直接發展起來的。在我國考古文獻中，將海拉爾【註七一】、柿子灘【註七二】、靈井【註七三】、沙苑【註七四】和獨石仔下層【註七五】等遺存，均定為中石器時代，近年發掘仙人洞及吊桶環的結果，將這兩遺址的下層定為「舊石器時代末期或中石器時代」，上層定為「新石器時代早期」【註七六】，也沒有排除兩遺址下層屬中石器時代的可能性，同時，廣西柳州白蓮洞的發掘，又將其確認的二期定屬中石器時代【註七七】。可見，中國南、北地區的舊、新石器時代之間確橫隔著一個時代，或可曰後舊石器及原史新石器時期，或稱之為中石器時代。名稱不同，實質則一。這一問題自八〇年代以來，尤其是在近十年中被淡漠了，今後應把這一問題重新撿起

【註七〇】：張忠培：〈中國考古學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文物》，一九九八年，三期三四頁，北京。

【註七一】：安志敏：〈海拉爾的中石器遺存——兼論細石器的起源與傳統〉，《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三期二八九—三〇六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七二】：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縣柿子灘中石器文化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九年，三期三〇五—三二三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七三】：周國興：〈河南許昌靈井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一九七四年，二期九—一九八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七四】：A安志敏、吳汝祚：〈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一—一頁，科學出版社，北京。B半坡博物館等：〈陝西大荔沙苑地區考古調查報告〉，《史前研究》一九八三年創刊號一〇—一—一三頁，西安。

【註七五】：戴國華：〈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類型與分期〉，《考古學報》一九八九年，三期二六八—二六九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七六】：《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版，北京。

【註七七】：柳州白蓮洞洞穴科學博物館等：〈西柳州白蓮洞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輯一四三—一六〇頁，一九八七年，成都。

來，加強研究，搞清楚它的時代和文化特徵。

其二，如果確實存在一個中石器時代，那麼，農業起源的探索就不是舊、新石器時代轉化的命題，而是中石器時代進步到新石器時代的問題。同時，應指出的是，在實現中、新石器時代轉化時，既存在發明種植農業這類形態，又存在發展採集，尤其是漁獵經濟的另類形態。自嫩江及松花江流域以東的廣大地區甚至於新石器時代較晚階段，依然存在諸如新開流文化〔註七八〕那樣的主營漁獵經濟的考古學文化，同時，據文化譜系分析，可推知它們的祖先都在經營採集—漁獵經濟情況下，獨立地發明了陶器、磨光石器而實現了向新石器時代的轉化。這類營採集、漁獵的新石器時代或早或晚的居民，也廣泛分佈於華南地區〔註七九〕。陶器、磨光石器、採集—漁獵和定居生活，是這類居民已居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標誌。可見，和營種植農業居民一樣，採集—漁獵居民也營定居生活，需發明和使用陶器。站在這些不同經濟類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前，人們看到從中石器時代多源轉化為新石器時代諸文化的同時，也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種植農業的出現，是區分中石器時代文化和種植農業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標誌的話，那麼，劃分採集—漁獵型新石器時代文化和中石器時代文化的標誌，是否是陶器的發明，或是石器磨製技術的進步，或是採集—漁獵生產水平的提昇？或是這些指標的某種組合而使中石器時代文化轉化為新石器時代文化呢？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採集—漁獵經濟，有那些變化或發展，而促進了舊、中和新、新石器時代的轉化？這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環節，而需在實踐中解決的問題。

其三，至今中國考古學研究說明，種植農業型新石器時代文化可分為兩類：一是稻作農業；另一為粟作農業。前者，目前見到的最早期遺址可以玉蟾岩和仙人洞及吊桶環的上層為代表。玉蟾岩遺址堆積中含稻屬硅酸體，發現四粒半稻殼。仙人

【註七八】：黑龍江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四九一—五一八頁，科學出版社，北京。

【註七九】：A 古運泉：〈從經濟形態探索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東南亞考古論文集》五七—六二頁，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一九九五年，香港；B 柳州市博物館等：〈柳州市大龍潭鯉魚嘴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考古》一九八三年，九期七六九—七七四頁，北京；C 柳州白蓮洞洞穴博物館等：〈廣西柳州百蓮洞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輯一四三—一六〇頁，成都。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訓練班等：〈廣西南寧地區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考古》一九七五年，五期二九五—三〇二頁，北京。

洞及吊桶環上層，經植硅石分析知有類似水稻的扇形體。後者，現在見到的可以鵝毛口及窯子頭〔註八〇〕為代表。賈蘭坡等研究者將其定為新石器時代早期，並把發現的較多的石鋤及少量的石鏟定為農業工具，雖未見到種植的籽實或其跡象，據地理環境或可推測為粟作之類的旱作農業。

這幾處遺址存在以下差別。鵝毛口及窯子頭位於河旁的小山包上，不見陶器及磨製石器〔註八一〕；玉蟾岩和仙人洞〔註八二〕為洞穴居址。前者是陶器與打製石器共生，後者則是局部磨製石器和陶器共出。在未能求得它們是否共時的情況下，只能將它們差別的原因，或歸於年代的早晚，或為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時，以它們所在地區來看，是否認為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先發明陶器，後產生磨製石器，而鵝毛口及窯子頭能否被認為中國北方的前陶新石器時代遺存？如是，那麼，長江中游是否還存在一個前陶新石器時期？

其四，玉蟾岩發現稻穀四粒半，經鑒定兩粒屬野生稻，另二粒具有栽培稻性質，可見，居民在經營稻作農業謀取食物的同時，為了生存，也相當程度上依靠對野生稻的採集。同時文化層中出土了大量動物遺存，其中植物種屬十七種，哺乳動物二十八種，鳥禽類二十七種，魚類五種，螺蚌類三十三種以及龜鱉類、昆蟲等，可知採集—漁獵經濟仍是當時居民生活的主要來源。既然，稻作農業的產物只在居民食物中佔居比較須要的地位，那麼，就難以認為稻作農業的發明，在經濟生活中促進這類居民從中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是，促進這類居民從中石器時代轉化到新石器時代的基本因素是什麼？這是今後有待探討的問題。同時，應指出的是，稻作或粟作農業這一新事物的日後發展，在居民生活中便日益顯出其重要性，至它們成為居民的基本作業，產物成了居民的主要食物時，則是這類居民邁向文明時代的基點或墊腳石。由此看來，於研究種植農業時，不僅應探索它的起源、技術進步及傳播，同時，也要追尋居民食物結構的歷時變化，以了解種植農業產物何時成為居民的主食。

【註八〇】：陳哲英、丁來普：山西懷仁窯子頭的細石器遺存，《史前研究》一九八四年，四期六三一—六九頁，西安。

【註八一】：鵝毛口的報導中，有一件磨製殘石斧，就其器形觀察，當晚於該文報導的其它石器，可能和文中報導的陶片屬同一年代，或許更晚。

【註八二】：吊桶環遺址，發掘者認為是仙人洞居民的臨時性營地或屠宰場。

其五，中國除存在農業文明外，還存在另一種文明形態，即基本上處於長城地帶的牧業文明。據文獻記載與迄今考古發現所知，除新疆情況不明外，牧業文明可能萌芽於夏代（其時的四墳文化火燒溝墓地的居民的畜牧經濟還相當發達。）於商代後期獲得了巨大發展，而完善於戰國西漢時期。匈奴口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耕田」【註八三】。這當然是較完善的牧業文化形態。鑒定畜養動物種屬，搞清楚動物馴養，尤其是牛、馬、羊的畜養進程，是探討牧業文化起源與發展的前題。公元前第十千紀，西亞已馴養了羊。中國與此不同，這時期遺存發現較少，且基本上未作動物鑒定。公元前第六千紀的老官台文化到公元前第四千紀前期的西陰文化時期，經鑒定確定為家畜者不出黃牛、水牛、豬、雞、狗幾種，缺乏馬、羊，因而難以於這時期尋找牧業文化的起源。

牧業文化淵源能否從分佈於長城地帶的西陰文化時期之後的史前文化中求索呢？從商代後期至西周初期分佈於長城地帶的牧民的總體文化特徵及其淵源來看，大致可分為甘寧青、河套和張家口以東三個地區。依考古學文化譜系關係觀察，前兩地區的牧民當是從農業居民中分化出去的，後一地區牧民很可能是從漁獵民演變過來的。漁獵民轉變為牧民，或同時或先也引進了種植農業生產技術。這僅是從文化譜系觀察得出的認識，且具有相當的假設性，還需得到首先包括畜養動物種屬在內的多方面研究的證實。

河套地區無畜養動物種屬鑒定資料。至於張家口以東的長城地帶的畜養動物鑒定所知的信息是：富河溝門遺址無馴養動物，紅山文化無馬飼，養豬、狗、綿羊與雞。由於對出土動物遺骸未能進行全面鑒定，這些信息難以十分準確。這地區從漁獵演變為牧業文明的偏堡子—高台山—夏家店上層這一譜系文化中包括夏及其以前的遺存，發掘工作少，且無動物鑒定資料。因此，現在還難以把河套及張家口以東的長城地帶的牧業文化的起源說個明白。

相對來講，長城地帶的甘寧青地區，動物鑒定資料較多。這裡公元前四千紀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已飼養了豬、犬、山羊、

【註八三】：《史記·匈奴列傳》二八九七頁，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北京。

【註八四】：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甘肅靈台橋村齊家文化遺址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一九八〇年，三期二四頁，西安。該遺存非屬齊家文化，年代早於齊家文化，參見拙著《齊家文化的研究》，《中國北方考古文集》一二九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綿羊、雞，公元前三千紀中期的靈台橋村^①〔註八四〕出現中國年代最早的羊卜骨，說明養羊業在此期已獲得相當發展，公元前三千紀晚期至夏紀年早期的齊家文化飼養豬、狗、羊、馬，大量使用羊胛骨占卜，說明已較普遍地養羊了。處於夏紀年而分佈於河西走廊的泗渠文化的情況有別，民樂東灰山居民，種植小麥，主營農業，兼營畜牧及狩獵〔註八五〕；而玉門火燒溝人死後隨葬狗、豬、馬、牛、羊，用羊隨葬較多，隨葬的成對羊角，分為大羊、中羊、小羊，彩繪的狗、馬與雕塑的羊頭、狗，均形態逼真〔註八六〕。他們是兼營農牧，且所營牧業已相當發達或已成為主業的居民。根據上述，以及考慮到火燒溝人和其同期新疆居民有著文化聯系及交流的事實，似可認為甘寧青地區牧業文化是在傳統的養羊業的發展基礎上，接受古西域文化的影響而興盛起來的。

概而言之，以上提出的問題是：採集—漁獵經濟，在舊、中、新石器時代的狀況，它的發展怎樣促進了舊、中和新石器時代的轉化，它在採集—漁獵型和種植農業型新石器時代演變的具體情景；種植農業的起源，對促進中、新石器時代轉化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種植農業成為居民主食之源以前的發展歷程，以及它在走向文明過程中是怎樣發展的，和起了什麼作用？馴養或飼養動物是如何發展的，牧業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除此之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中，於自然環境、工藝、社會組織及社會體制，和信仰宗教方面也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例如：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中的「區」的研究，工藝的進步與手工業的分工，老官台文化時期以前的社會組織（如住居於玉蟾岩、仙人洞這類面積不大、人數較少的洞穴居民組織的結構、性質，以及從這些洞穴中走出來至形成八十墩這樣規模聚落居民組織的演變過程，我們仍一無所知。）王權的起源與發展，宗教的演變與巫師階層的形成，和神權的起源與演變，等等，均不一一述及了。總之，至今雖已基本完成了相關時期史前史的重建工作，但完善史前史的研究，前面的道路，還有待開闢，很長又十分艱難。

初稿成於一九九八年十月，改定於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三日

〔註八五〕：吉林大學北方考古研究室等：《民樂東灰山考古》一四〇—一四一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北京。

〔註八六〕：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四二—一四三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北京。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七卷 第一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